

「社會生態農業」理念的實踐及困局

原鳴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有機和生態農業經歷了飛速增長。2000到2006年間，中國有機農業耕地面積從世界第四十五位躍升到第二位，在2005至2006年間就為世界有機耕地面積貢獻了12%的增長量，佔世界年均增長量的63%；到2008年，中國有機農業耕地面積佔到了世界的11%^①。另據瑞士有機農業研究所(FiBL)的統計，從2008到2022年，中國在有機農地面積、有機農地佔全部農用地比例上，都經歷了55%以上的增長，有機產品的零售總額更是上漲了二十六倍^②。由於從事有機和生態農業的小型農場數量眾多，且極為分散和不穩定，上述數據應該大部分來自已參與有機認證、具備認證資金和一定規模的有機農業企業和大型有機農場，而大多數小農及其組織尚無法在統計數據中顯示。但是，即便是不經意的一瞥，都能注意到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城市中人頭攢動的農夫市集、各地隨處可見的生態農產品店鋪，以及線上活躍的生態農產品帶貨直播。任何一個生活在當今中國大陸社會的人都不難發現，蓬勃發展的有機和生態農業，已經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社會其中一道風景線。

這一發展態勢的推動力量之一，是中國政府近幾年倡導的綠色轉型。在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目標之下，中國政府力圖通過改善農業產地環境、打造農業綠色產品鏈條、減少化學肥料和農藥的投入等，實現農業的綠色轉型^③。但是，需要同時注意到，這種蓬勃的發展由兩個相對獨立的領域構成：以國家主導的「正式」領域和以社會主導的「非正式」領域。二者的區分不僅在於是否經過有機認證，這裏的重點在於，「正式」領域的首要任務並非發展一個獨立於主流農業生產，旨在融合社會建設、城鄉聯結和個體福祉的農業模式；在糧食安全和生態文明建設的考慮下，國家推動的生態農業，更側重在技術專家的主導下提高生產力和產量，因此規模化、集約化、專門化和高效生產，是「正式」生態農業的首要目標。它僅僅將生態農業視為一項不同於依賴化肥和農藥的主流農業的技術，或將其作為主流農業和食品供應體系的補充，而較少關注其社會價值^④。與此相應，本文聚焦於當下中國有機和生態

* 本文係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生態農產品食品短鏈推進城鄉互補的策略研究」(項目編號：21YJC84003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農業領域的「非正式」部分，即數量眾多的小型生態農場，其主體是從事生態農業種植工作的農民。下文中，筆者將以「生態小農」來指稱這一群體。

本文希望指出，當下中國眾多分散和自發的生態小農及小農場發展，應該被視為特定歷史情景和脈絡中的產物，其出現和發展背後不乏具有特定立場的群體的推動和感召。這些群體在推動生態農業發展的同時，表現了對貫穿於整個二十世紀中國鄉村建設的反思和繼承。本文將重點考察在小型生態農場發展中居功至偉的「新鄉建」團隊^⑤，不僅因為他們和當下「非正式」領域的生態農業發展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還因為通過「生態農業」，這一群體表達和汲取着特定的政治立場和思想資源，對中國歷史和未來抱有特定的理解和訴求。另外，這一群體可稱為「知行合一」的典範，其核心成員不僅深入地實踐生態農業，同時對中國社會和中國農村問題具有整體性的研判。對「新鄉建」團隊及圍繞它的爭論進行討論，能夠充分展示當下中國生態農業發展的複雜和多層次面向，以及生態農業與中國整體問題之間的關聯。

一 中國生態小農的興起

所謂生態種植，即不使用化肥和農藥，代之以有機肥料和物理干預的方式，實現有利於土壤、河流和其他環境的可持續種植。在很多情景中，這些經營小型生態農場的農民都自稱為「新農人」，他們是過去幾十年中國城鎮化、高等教育發展、農業產業化和規模化背景下的「再農民化」產物。這些生態小農基本都受過良好教育，學歷在本科以上，絕大部分人都是通過高等教育從農村來到城市，也有從小在城市裏成長、卻矢志從事農業的城市青年，亦有懷抱生態理念、退休或棄商後專門從事生態農業的幹部或商人。

生態小農一般具備一定資本，返鄉投資的規模能夠達到100萬元人民幣左右，甚至更高。他們普遍從鄉村多位農戶手中獲得租期不長（十至二十年）的一片土地，規模從數十畝到上百畝不等。這些生態農場大多分布在大城市周邊鄉村，以線上社交平台和線下農夫市集作為生態農產品的主要銷售渠道，供應城市部分居民日常所需。和主流的產業化農場一樣，這些小型生態農場在日常勞作、土地養護、設備管理之餘，會將獲得的盈餘進行再投資。但是與主流的產業化農場不同，小型生態農場再投資的目的不是為了資本增值、產量增長或土地擴張——這往往導致人和土地、社會和自然之間愈演愈烈的「脫嵌」；生態小農在經營之餘，更傾向進行走訪、學習、自我提升、社區分享和建設等，這些活動均指向社會和生態的增益與更加深入的「互嵌」^⑥。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屢次農業改革，構成了生態小農出現和發展的背景。在經歷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集體化運動之後，中國在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開啟了「分田到戶」進程。進而在上世紀90年代農業現代化的旗幟下，中國政府啟動了農業產業化和農產品市場化的步伐，旨在將小型、以家庭為主的農業生產模式，改造為以市場為取向、大規模、專門化並生產更高價值農產

品的農業生產模式。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包括以私人和國有企業為主，進行縱向一體化整合，以及促使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的流動更加通暢。農業現代化和產業化的總體目標形塑了上世紀末期以來的中國農業發展模式^⑦，但是，在農業資源短缺的情況下，盲目追求農業作為現代產業的增長，其結果必然是化學品等各種投入的增加，最終破壞城鄉生態，造成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⑧。於是，繼2000年前後出台一系列限制土地流動和保護農民的政策之後，2007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積極發展現代農業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進而調整了農業定位，指出「農業不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而且具有原料供給、就業增收、生態保護、觀光休閒、文化傳承等功能」^⑨，由此開啟了此後十餘年農業從生產主義轉向後生產主義的道路^⑩。

在國家推行農業現代化和產業化、由此帶來的「三農問題」（農業、農村、農民）和食品安全隱患，以及以城市為本位的後生產主義導向這些多少帶有張力的訴求之間，中國的生態小農具有一系列特徵：首先，生態小農的出現，既不同於前一階段的「農民的終結」的生產主義導向，也區分於將鄉村改造為景觀，提供休閒、旅遊、生態、文化體驗功能的「農業的終結」的後生產主義導向，而是一條探索將鄉村和農業重新結合的道路^⑪。其次，這種重新結合，似乎源於社會面對沉痾日久的食品安全問題的應激反應^⑫。2008年中國食品安全事件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和討論，還激發了延續至今的眾多社會創新實踐，如社區團購、「巢狀市場」、「社區支持農業」（下詳），等等^⑬，這些實踐都以小型生態農場的蓬勃發展為依託，消費群體則以具有一定購買能力的家庭為主，其首要關切更多在於獲得無重金屬和化肥農藥殘留的農產品，而並非如國際生態農業運動中常見的那樣，出於對農民和農村生存狀態或者生態可持續發展的關注^⑭，也並非意在通過農產品建設一個以信任為紐帶的緊密的社會共同體。同樣，這些實踐並非出於某種對抗全球化的姿態，即基於地方保護主義立場而對本土生產者的青睞——實際上，2000年左右的中國，就食物喜好而言，正是擁抱全球化最熱切的國家之一。換言之，表面上看來，中國的生態小農是以中產階層為主的零星、個體化、自發的自救行為，是本土食品安全問題頻發後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缺乏如北美和歐洲那樣的生態運動背景、市民社會環境^⑮，與諸如社會正義、社會信任、國家發展、全球化食物體系批判或地方保護主義等更具政治色彩的議題無關，也與二十世紀中國和國際農村整體問題相對分離。

二 「新鄉建」與生態農業

（一）「三農問題」的提出與「新鄉建」團隊的目標

如果將目光從食品安全問題上擴展開來，生態小農數量的驟增與「三農問題」的提出之間的密切關係很快就會進入視野。上述生產主義導向，使得在

二十世紀初期出現，又在二十一世紀初期重現的中國「三農問題」的隱憂更加凸顯^⑮。在2000年左右提出「三農問題」的學者和官員看來，中國農村問題與二十世紀後半期席捲全球的「綠色革命」、農業現代化、農業工業化進程密切相關，這些以「發展」之名相互疊加和加劇的進程，對生態環境產生了巨大破壞和影響，將農業從人和社區的因素中抽離，並引發了鄉村的凋敝。在對主流的農業現代化批判姿態下，一批密切關注「三農問題」的學者和社會活動家提倡新鄉村建設運動，逐漸集合為一個以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為核心、被稱為「新鄉建」的團隊，他們希望通過重建鄉村社會和文化的紐帶，將農民重新組織起來，恢復農村的活力，以抵禦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及其體現，包括農業工業化、全球化和市場化等。

「新鄉建」之「新」，在於它是對二十世紀初期鄉村建設運動的繼承和發揚。2003年，「新鄉建」團隊在河北定州市翟城村成立了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以下簡稱「晏陽初學院」），隨後又在北京成立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平民教育、農民培訓、資助農民創辦合作社和社會公益組織，以及鄉土文化重建等，是這兩個機構的工作重點。晏陽初和梁漱溟兩位在二十世紀初期身體力行主持鄉建試驗的學者，被「新鄉建」團隊視為重要的先行者和思想資源，因為他們對二十一世紀中國整體問題的診斷和治療方式，和兩位鄉建先行者一致：1920和1990年代，中國都經歷了以工業化為主的發展模式帶來的陣痛，人才、資金和土地流出鄉村，其結果是農民的主體性喪失、鄉村共同體瓦解、農民去組織化和文化價值崩潰。而對此問題的解決，是在對中國作為「原住民大國」的地位之清楚認識上，以鄉村文化建設、培育農民主體性和將農民組織起來為主要手段，通過知識份子與農民、城市與鄉村的直接連接，以鄉村為核心和起點，尋找非主流現代化、非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⑯。

在「新鄉建」團隊的一系列活動中，生態農業具有獨特的地位，原因如下：第一，當代鄉建實踐面臨全新的危機與挑戰——能源緊張、環境污染、土壤板結、種子—農用物資—灌溉成本增加、健康無污染食品稀缺。第二，中國近四十年的快速「非農化」，讓城鄉關係處於不平等和割裂的態勢中，在很長一段時間，農村問題都被城鎮化問題所掩蓋，當公眾的目光被現代化的進化敘事佔據之際，要喚起全社會對農村的重新關注，甚至農民對自身價值的重新認識，並非僅僅扎根鄉村就可以獨立完成。第三，「新鄉建」團隊的願景和中國政府農業現代化的願景多少處於緊張狀態，更與主導中國過去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理念、私有化和市場化進程對立^⑰；「將農民組織起來」的目標也與基層政府的經濟發展訴求有齟齬。實際上，晏陽初學院就曾以非辦學機構為名被迫關停^⑱。在新的挑戰和重重困難中，生態農業不僅能夠借助全社會關注的食品安全危機，喚起人們對農村價值的重新關注，並且為「新鄉建」團隊提供了與中央政府和基層政府緩解緊張關係、達成共識的可能。而2008年集中爆發的食品安全事件，為生態農業，尤其是「社區支持農業」的興起提供了絕佳的機會。

(二) 從「社區支持農業」到「社會生態農業」

「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是二十世紀60年代興起於日本、德國和瑞士的農業生產和消費形式，它力圖在農場和消費者之間建立合作關係，促使二者共擔風險、共享收益。雖然在其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多樣化的合作形式，但健康生產、相互承諾、互助、本地化生產和直銷，基本是各地CSA都遵循的原則。

其實，中國的CSA嘗試並非始於2008年。2006年，在香港公益組織「社區夥伴」和成都城市河流研究會的支持下，成都近郊的安龍村就嘗試過以CSA模式聯通鄉村與成都市區消費者。在「新鄉建」團隊內部，晏陽初學院也曾在2006年組織翟城村示範農戶開展生態農業試驗，嘗試通過生態農產品建立城鄉聯結。2003和2007年，時任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何慧麗曾先後為河南蘭考縣南馬莊村組建生態大米種植合作社、養豬合作社，並親自發起成立南馬莊無公害大米「購米包地小組」和準消費者合作社「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由此搭建了「生態型城鄉互助合作的短鏈農產品銷售端」，為北京和鄭州的部分市民提供生態農產品^②。然而，前期的多次嘗試未能將輿論導向農村和生態農業^③，直到2008年「小毛驢市民農園」(以下簡稱「小毛驢農園」)的建立，生態農業才獲得了媒體鋪天蓋地的正面報導和公眾關注。究其原因，2008年爆發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因為受害者年幼且數量眾多^④，突破了公眾忍耐的底線，讓人們對生態農產品趨之若鶩。是年，北京市海淀區政府特意為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劃定了產學研基地，「新鄉建」團隊於是在鳳凰嶺山腳下啟動了市民農業項目，並於2009年借鑒國際CSA經驗，以會員制配送產品和市民租地的形式經營小毛驢農園。為了傳承傳統農耕文化，農園以當年在學院餵養的小毛驢命名^⑤。而小毛驢農園的會員，也很快從第一年的五十幾個家庭增加到第二年的三百多個家庭^⑥。

可見，在2003至2007年間「新鄉建」團隊的工作屢遭波折時，小毛驢農園的成立恰逢其時，它讓「新鄉建」團隊重新找到了重要的抓手，打開了一片廣闊的天地。自此時起，CSA(其後被正式翻譯為「社會生態農業」，下詳)、市民農業、消費者教育^⑦躍然成為具有更廣泛社會影響力的食品安全問題的解決之道，在這一系列的活動中，公眾的目光開始被引向鄉村。

「新鄉建」團隊的工作，在此後十數年間主導了中國生態農業的發展方向和主要方式。借助小毛驢農園的影響力，2010年「新鄉建」團隊在江蘇省常州市武進試驗區成立「大水牛市民農園」，2012年在北京成立「小毛驢柳林社區農園」。不僅如此，「新鄉建」團隊還積極推動全國各地生態農場的網絡建設，2009年發起第一屆全國社區支持農業(CSA)大會，成立「市民農業CSA聯盟」，又在2015年發起成立「中國社會生態農業CSA聯盟」。在2009至2016年間，「新鄉建」團隊共組織了八屆全國CSA大會，參會人數達五千人^⑧。在筆者於2018年參加的第十屆CSA大會上，光是演講和分享嘉賓，包括國際生態農人、高校學者、基層幹部、生態農場主、合作社帶頭人、返鄉青年、鄉村創

業者就達到二百餘位，參與的農場更達數百個；並且，基層政府前所未有地對該屆CSA大會給予了大力支持，因為在2017年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之後，「新鄉建」團隊推動的小型生態農場發展，成為基層政府理解的「發展綠色生態農業」的路徑之一，而其工作需要依賴的，恰恰是各種形式的帶頭人、鄉村精英和創業者²⁷。

在十數年的探索中，中國生態農場的模式逐漸成型，從對“CSA”的翻譯中可見一斑：2009年的第一屆全國社區支持農業大會上，“CSA”被按照字面意思翻譯為「社區支持農業」；2012年，為了突出其中「互助」的意涵，“CSA”被翻譯為「社區互助農業」。據小毛驢農園創始人之一、「分享收穫農場」的石媽解釋，「社區支持」的翻譯有單向的消費者支持生產者的誤導，而「社區互助」則意味着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生產者與生產者、農場跟農場之間的互助²⁸。到了2016年，這一翻譯進一步被修正為「社會生態農業」²⁹。在2013年的一次採訪中，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主任、「新鄉建」最核心的人物溫鐵軍教授就已經表達出後來逐漸成形的「社會生態農業」中「生態」的含義：「CSA是社會化的安全農業，或者社會化的生態農業，本身體現的是生態化，生態化就是多樣性，多樣性就包括着市民和農民之間的合作聯合……是中國現代條件下的創新，中國生態化農業的一種創新方式。」³⁰

在這個解釋中，「生態農業」不再僅僅被視為一種農業生產技術，而是一種社會關係，是城鄉之間、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市民和農民之間的合作和互助關係，其核心是「生產—消費」雙方在現有社會結構中的直接聯繫。也是在對「生態農業」的這種解讀基礎上，「新鄉建」團隊借鑒國際經驗，在城市一端發起成立了北京有機農夫市集，並在上海、西安、廣州、天津等地發起全國農夫市集，以及推動了上海「菜團」、北京「回龍觀團購」等社區團購的發展，這些工作均旨在建立「互助」雙方的直接關係、重建城鄉個體之間的信任。

(三)「社會生態農業」中「社區」的缺位

小毛驢農園還為有志於從事生態農業的「新農人」提供實習和培訓的機會。2008至2016年，「小毛驢市民農園CSA實習生計劃」共培養了111名「新農人」，成為全國各地發展CSA的帶頭人和返鄉農業創業的主力³¹。進而在十數年中，「新鄉建」團隊在各地推動成立了約五百多個生態農場。據筆者觀察，經營這些農場的「新農人」在微信群、微博和線下聚會中頻繁互動，分享種植和經營經驗，也不時觀看由「新鄉建」團隊成員和各種專家主講的講座，內容包括國家發展歷史和趨勢、資本主義經濟運行原理與農業工業化弊病、國際生態農場經驗、生態種植技術、市場信息，等等。也是在這些「新農人」頻繁的交流和互動中，關於何為「生態小農」及其存在的意義逐漸達成共識，即相信可以和應該憑藉家庭農場個體的經營和互助，反抗資本主義農業工業化。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當下中國「非正式」領域的生態農業主體是小農和小農場。它們以家庭為單位，通過線上和線下平台直接聯絡消費者作為銷售渠

道。雖然生態小農為城市消費者提供安全的生態農產品，成為中國社會生態農業的主要形式，但是一方面，除了鬆散的「聯盟」，生態小農之間並未建成堅實的共同體；另一方面，即便有消費者受「教育」後能夠接受生態農產品與大型超市農產品相比在品相上的劣勢，或者願意以預充值的方式支持部分生態農場，歸根結底，生態小農仍然需要獨立面對市場，而城鄉之間、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市民和農民之間的合作和互助關係並不充分。因此，如果說CSA中的“C”意味着「社區」(community)，在很多情況下，即便在生態小農自己看來，中國也是沒有“C”的；在此，市場或消費者偏好可能成為生態農場經營上主要甚至唯一的考慮。

例如，一位具有豐富經驗的生態農人在被問及如何平衡農場作物多樣性選擇時，認為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是農場距離城市的遠近，城市近郊的農場因為供應單個家庭日常所需，多樣性要求高，而距離城市較遠的農場，從收益和成本的角度來看，更適合生產單一作物^②。更甚者，在很多情況下，生態農場以「社會生態」為名、在堅持生態種植技術的同時，卻以主流市場和商業的模式銷售產品。據小毛驢農園創始人之一黃志友觀察，目前全國各地以「社會生態農業」理念經營的生態農場(下稱「CSA農場」)，正在由本地化公益試驗變成大規模商業模式^③。實際上，作物相對單一，以及以消費者需求為主的經營方式，是中國小型生態農場的顯著特徵。「社會生態農業」更多是以生態小農為核心的「生產—消費」交換，而「社區」並不在場。

三 生態小農的理念與實踐

(一)「新農人」對中國傳統農業的理解

作為生產和經營主體的「小農」，同樣也是「新農人」的價值取向。首先，「小農」意味着對中國傳統農耕智慧的繼承。目前，在生態小農圈中廣泛流傳着一本1911年出版的著作——《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書中東亞「小農」精耕細作的傳統被作者金(F. H. King)大加讚揚。值得一提的是，此書是由「新鄉建」團隊的兩位核心人物程存旺和石嫣翻譯，並由溫鐵軍作序，於原著出版百周年之際翻譯成中文版。而《四千年農夫》之所以受到「新鄉建」團隊的讚譽，在於該書對美國大農場農業所作的深刻反思，以及對東亞小農模式「資源節約」、「精耕細作」、「家庭理性」等優越性的重新發現^④。

在「新鄉建」團隊對中國問題的整體研判中，「原住民大國」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紀遭遇的「負外部性」是「三農問題」的根源^⑤，所以重振「原住民大國」的根基——「小農」，而不是盲目追求美國式的「大規模+集約農業」，成為抵禦這種「負外部性」和探索「另類現代化」道路的依託。《四千年農夫》因而受到生態小農群體的肯定。與此相關，「小就是美好」更成為「新鄉建」團隊培訓

的「新農人」的自我認知和定位。在「新農人」對中國傳統農業的理解中，「小農」的主體主要指家庭。這也符合目前中國大多數生態農場的現實：它們多由中青年夫妻經營，日常耕作和生活、子女養育都發生在農場，農場也成為他們的情感依託和實現人生價值的場域。在中國農耕文明理想及小家庭生活和生產的現實結合之下，農業、農村和「故鄉」的意象進一步聯繫起來。從2012年開始，「新鄉建」團隊開啟了全國「愛故鄉計劃」，呼籲和招募大學生、返鄉青年、農民工和藝術家重新發現鄉村，發掘自身和鄉村關聯的可能性^⑧。在情感聯結和審美活動中，作為「四千年農夫」的「小農」形象與合理性愈發堅實。

然而，《四千年農夫》作者對「東方農業」讚譽之餘，他的重點並不在於諸如農家肥之於環境和人類生活的保護或增益，而是在於其「高效」。例如他認為把營養素通過農家肥返回田地，能加強對土地的利用，從而讓經濟和人口數量快速提升。而這樣的觀點其實並不來自他在東亞三國旅行時所獲得的啟發，而是來自於一個為時已久的歐洲內部爭論：在《四千年農夫》發表之前的半個多世紀，政治家和工程學家就一直在倡導合理利用農家肥，作者在遠行之前就已經成為這種觀點的支持者^⑨。所以，該書對東亞農業制度的讚許，不過是通過西方稜鏡的東方學式的凝視。在他的筆下，中國是一個亙古未變、綿延千年的農業文明，書中不僅有對古老農業技術的描述，還充斥着特意拍攝的、非常「典型」的農夫形象。在這種凝視和期許中，他忽視了恰恰是小農式生產而帶來的環境惡化^⑩，也忽略了在寫作《四千年農夫》之時，中國正在引進的化肥及其對農業的改變。

作為現代化進程衝擊之下失落的傳統，農業、農民和土地往往和東方學想像與民族主義情緒相聯繫，也往往成為對抗工業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殖民主義、全球化等的武器，尤其是將它作為現代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的傳統思想資源時，它更提供了不同於當下已然惡化的人與自然相處的方式，以及「另類現代化」的科學依據。事實上，在《四千年農夫》的書名翻譯中，傳統和未來、民族情感和生態技術就已經進行了巧妙的結合——英文原著的副標題「中國的永恆農業」(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被翻譯為「中國的永續農業」。

(二) 生態小農與新家庭主義

同樣需要反思的是支撐「小農」意象的另一個依據——家庭。在生態小農看來，家庭作為中國農耕文明的單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但他們未注意到，當下中國家庭形態恰恰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產物。一方面，現代風險社會背景下，中國家庭愈發成為承擔和應對風險的主體，例如親子養育和保證自身食品安全愈發成為個體的責任，由此催生出眾多中產階層家庭對有機食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個體化的家庭也愈發以中青年夫妻及其子女而非父輩和宗族為中心運作，這同樣符合大多數生態農場的經營者的情況。所以，當下生態小農和生態農產品的消費者，都是二十一世紀中國「新家庭主義」的產物^⑪，而非農耕文明的載體。

《四千年農夫》的譯介，表明了「新鄉建」團隊與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交鋒時所選取的特定角度，是以「小農」為單位與核心進行組織，並以想像中的中國農耕傳統和鄉土作為共同體情感依託。然而在這裏，無論是「小農」還是「農耕文明」，都是一種寬泛、流於表面和本質化的文化意象，除了個別情況，它都不是對生養的故鄉的具體認知和感知，很多「返鄉青年」返回的不是自己的故鄉，而是想像中的、作為一個概念類別的「鄉土」；同樣，小農的耕作技術也不是對傳統農業技術細緻而微的研究和創新，「新農人」的生態農業知識和技術往往來自澳洲、日本、馬來西亞。而這種本質化的誤解，也恰因符合城市中產階層在消費農產品時對農村的想像而不斷發酵。實際上，近幾年小型生態農場在生產之餘，開始接待愈來愈多來自城市的「研學團」。這固然源自生態農產品本身回報微薄的迫切現實，但更重要的是，這種轉向是因為生態農場為城市裏的孩子提供了家長希望看到的「農村」。在「新農人」、城市消費者關於生態農業的想像和實踐中，真正的「小農」及其留存的傳統農耕技藝，往往處於邊緣地位。

（三）農民邊緣化與「精英俘獲」

黃志友在小毛驢農園成立十年回顧文章中，坦言小毛驢農園及後續CSA農場的發展，契合了「新青年的創業夢與中產群體的田園夢」，而生態農業的從業者，也由早期以滿懷社會公益理想的鄉建青年為主，變成當前以生態農業為創業和生計的「新農人」、以「社會生態農業」為名的社會良性資本家為主⁴⁰。如本文開篇所述，生態小農當中很多人是接受了高等教育、在城市裏學習或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具有一定資本的「再農民化」的「農民」。相對於鄉村傳統農民而言，他們無論在見識、知識、資本還是年齡上都有優勢，是當之無愧的「精英」。

隨之而來的問題即是「精英俘獲」現象⁴¹。通常的情況是，農民流轉土地給生態小農後，往往會被僱傭在農場工作，但他們的意見在生態農場的日常運作中往往不會被納入考量。而從當地農民的角度來看，他們對於生態農場的認知、參與意願和能力也的確有限。首先，他們不理解「生態小農」的理念和生產方式，農村中為時二三十年的農業產業化進程，讓很多農民失去了不依賴農藥化肥種植作物的技藝，一些情況下，在生態農場工作的農民眼見作物長勢欠佳，甚至還會偷偷打藥和施肥。其次，生態農場面臨的普遍情況是不被鄉村接納，偷菜、偷水和地塊劃分糾紛時有發生。要是生態小農不是當地人，這種情況更甚。甚而，對於很多返鄉青年而言，面臨的首要反對意見往往來自他們的父輩，因為上一輩的辛勤勞作是為了供養子女進城讀書和擺脫農民之苦，但子女返鄉「當農民」的決定讓父輩感到自己一生的努力落空。最後，農民往往無力獨自面對當下中國過於繁榮的物流和電商環境，而生態小農日常生產中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要處理打包郵寄、線上客戶問詢，甚至在線直播。綜上種種，不難理解生態農場的常見分工：中青年生態小農在日常田間作業時觀

察作物和土壤狀態之後，作出生產技術細節的決定和生產計劃，親自執行較為精細的工作（如育苗和快遞分裝），並僱傭當地農民完成較為粗重的工作（如除草）。可見，同為「小農」，生態小農與傳統農民在知識、技能、信息獲取和運用等方面均存在差距，「精英俘獲」的現象同樣發生在二者之間。

「社會生態農業」中「社區」的缺失、對「小農」的本質化想像、真正的農民的邊緣化和生態小農的「精英俘獲」等問題，凸顯當下中國「非正式」領域的生態農業發展態勢中的張力，而「新鄉建」團隊對此並非毫無知覺，圍繞小毛驢農園形象的爭論或許已經讓這些真心實意服務農村的學者和青年，發出和梁漱溟類似的「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的感歎^④。如上所述，小毛驢農園的「吉祥物」是一頭毛驢，而創始團隊將其作為農園的核心意象並以此命名，是為了傳承傳統農耕文化，並表明用畜力抵抗化石動力的生態農業態度。但讓他們意外的是，當地農民對此甚為不解，因為他們期望團隊能帶來「更先進和現代化的農業技術」，而毛驢在他們看來卻是落後的象徵。這個小衝突讓核心創始團隊意識到中國農村問題實際與社會整體緊密相關^⑤，如上所述，「新鄉建」團隊對社會整體問題的回應方式，是試圖建立「社會生態農業」中城鄉之間、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直接聯結。究其根本，這種回應方式的選擇，在於對中國農村、中國農民的同質化理解。

四 「生態」如何嵌入「社會」

從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沿海地區繁榮的工商業和通商口岸貿易，從內地農村吸取了大量人才、資金，並使後者在與城市所代表的「現代文明」對比下，成為「落後」、「傳統」的代表^⑥。在這種以城鄉空間劃分的現代化敘事下，知識份子進而逐漸將「鄉土」和在其間生活的人們視為一個落後和停滯的整體及亟需改造的對象^⑦。與此同時，在咄咄逼人的西方現代性面前，「鄉土」、「農村」、「農民」又成為身份認同、民族情感和國家建設的依據。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知識份子參與了上述三位一體的知識生產，將農村視為一個同質、落後並需要改造從而面向未來的民族根基。例如費孝通對「鄉土本色」、「老根」的書寫有意無意地將鄉土描繪為永恆、自然化的整體。魯迅將鄉土視為有待改造甚至革命的過去，同時又將其視為喚起一個具有共同情感和目標的共同體的必經之路、一種身份認同的唯一資源。因此地方必須具有某種永恆不朽的價值，但又亟需變革，以便成為現代國家的基礎。由是，魯迅和費孝通一代學人身兼「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責任，在利用鄉土實現改良主義的目標時，又要面對身份認同的詩興^⑧。在他們那裏看到的，實際上是「鄉土話語」面對現代世界時必然產生的張力，因為作為一個生活空間的農村，恰恰是全球資本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張力節點。進而，鄉土作為「啟蒙」和「救亡」的張力節點，成為認識和想像農村的方式，被同時代的鄉建人物梁漱溟信奉，並在將近一個世紀後的「新鄉建」團隊中依然迴響。

因此，作為中華農耕文明代表的同質化和靜態的鄉村想像，或許恰恰是中國社會與「負外部性」遭遇的產物，與其說它是「另類現代化」的依據和出發點，不如說它是來自西方的東方學式凝視，或者站在現代西方立場的自我觀看。這種觀看忽視了新中國初期農村發展和農業技術中獨特的以「土洋結合」為代表的認識論實踐^④，也忽視了中國鄉村在整個二十世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二十世紀中葉中共的農村工作中，一方面調用一種或可被稱為「本質化策略」的手段營造和鞏固農民的形象及其凝聚力，另一方面又積極利用農村內部的階級分化和不同農村之間的差異化，作為土改、合作化運動及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依託，以此完成了持續三十年的農村合作化和集體化運動^⑤，其目的恰在於將這種具有「策略性」一體性的農村，改造成為一個集工商業、農業、文化教育為一體的多元和異質的生活空間。直到二十世紀末期，集體化運動的終結、農業產業化的啟動以及隨之而來的「三農問題」的提出，才使得農村和農民作為特定和整體性的領域，重新回到了中國政治和經濟的核心^⑥。

在反思和批判以工業化和產業化方式改造農業的農業現代化進程，進而聯結城鄉、重建鄉村的運動中，「新鄉建」團隊有意無意地延續了二十世紀初期知識份子對農村的本質化和整體性想像，甚至啟蒙姿態。在一些嚴厲的批評者看來，在「新鄉建」團隊「或許過於頑固的小農意象」中，忽視甚至再造了農村內部的不平等^⑦。誠然，小農的重新出現是近幾十年國際農業發展的主要趨勢，「新鄉建」團隊在這個意義上呼應了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國際農業運動^⑧。但是，在一個具有深厚社會主義改革和集體化經驗的國度，我們是否可以追問，作為「社會生態農業」主體和單位的生態小農數量和規模的不斷增長，是否中國生態農業的唯一路徑和起點？

當「新鄉建」團隊試圖通過食品安全問題喚起城市對農村的關注和支持時，似乎不應該忘記，城市消費者和農村生產者都是同一套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中的「弱勢群體」，二者在「生產—消費」關係上的互助，似乎不能夠解決社會和生態的整體問題。如批評者所言，這種形式的城鄉聯結，最多可被稱為「由具有購買能力的消費者創造的一個小空間，其間一種更為環境友好的農業生產形式可以保留，社會各界對農村作為一個環境和道德的純潔之地的形象可以存續」^⑨。

或許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理解中國農村與社會整體之間的關係。在「新鄉建」團隊看來，農村和城市、農民和市民、生產者和消費者，被視為功能性整體中的不同組成部分。在試圖建立這些不同部分的互助之餘，應該認識到，被「新鄉建」團隊視為實體存在、綿延千年的「農村」，恰恰是中國近百年與西方現代性遭遇的產物。它既不是一個四千年綿延的同質性實體，因此也並非西方資本主義衝擊的對象，反而，「現代/城市/工商業/市民」與「傳統/農村/農業/農民」的二元對立，恰恰是這種遭遇的產物，或者說是這種遭遇的症候。因此，如果說「農村」是症候而非癥結，那麼「新鄉建」團隊關於農村的想像、對農村困境的研判、對困境的解決方式，亦不過是中國近百年遭遇的症候的一部分。對症候與癥結的混淆，凸顯出「新鄉建」這種頗為機械的解

決之道，讓生態農業顯得不那麼「有機」。或許，此時需要提問的是，「生態」究竟如何嵌入「社會」之中。如果說「農村」、「鄉村」、「鄉土」是歷史發展的產物，那麼同樣，在當下中國社會綠色轉型的勢頭下，我們需要警惕將「綠色」視為實體的本質化傾向，以及將「綠色」與「農村」天然等同的傾向，並更加細緻地辨別關於綠色轉型的實踐、歷史軌迹和其中的政治立場差異。

註釋

① John Paull, "China's Organic Revolution", in *Marketing of Organic Products: Global Experiences*, ed. S. Bhaskaran and Suchitra Mohanty (Hyderabad, India: ICFAI University Press, 2008), 260-75.

② 數據來自 FiBL 官網，https://statistics.fibl.org/world/key-indicators.html?tx_statisticdata_pi1%5Bcontroller%5D=Element2Item&cHash=ba0aa70d46b2bb18dca4638c75aa654e。2008 和 2022 年有機農地面積分別為 1,853,000.00 公頃和 2,898,190.80 公頃，有機農地佔所有農用地比例分別為 0.35 和 0.55，有機產品零售總額分別為 450 和 12,397.58 百萬歐元。

③ 喬金亮：〈農業綠色底色更鮮明〉（2024 年 2 月 19 日），中國政府網，www.gov.cn/zhengce/202402/content_6931903.htm。

④ Stefanie Scott et al., introduction to *Organic Food and Farming in China: Top-down and Bottom-up Ecological Initiatives*, ed. Stefanie Scott et al. (London: Routledge, 2018), 6.

⑤ 據筆者查證，在中文語境中，「新鄉建」較早的提法出現在 2004 年一篇題為〈組織起來，建設新鄉村〉的簡訊（史存義：〈組織起來，建設新鄉村——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學員作品〉，《中國改革·農村版》，2004 年第 6 期，頁 30）。很多語境中，「新鄉建」都被視為一場運動而非一個組織嚴密的團體或機構。然而，正如所有的社會運動一般，「新鄉建」由一群懷有相似立場和實踐路徑的學者、學生、政治官員和社會活動家推動，他們在 1990 年代以來興起的新鄉村建設運動中，逐漸成為了推動這場運動的核心團隊。本文在這個意義上，為了討論的簡明，使用「『新鄉建』團隊」這一詞彙。關於「新鄉建」的發展歷程，參見何志雄、溫鐵軍：〈當代中國的新鄉村建設〉（2014 年 11 月 13 日），鄉村建設研究網，www.ruralstudies.com/prod_view.aspx?TypeId=69&Id=301&Fid=t3:69:3。

⑥ 波蘭尼(Karl Polanyi)著，黃樹民譯：《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⑦⑧⑨⑩ Alexander F. Day and Mindi Schneider, "The End of Alternatives?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Rural Acti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ossibility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5, no. 7 (2018): 1221-46; 1230; 1239; 1239.

⑪ 溫鐵軍：〈推薦序：生態農業與環保農村〉，載石嫣：《從土地到餐桌的變革：「新農人」變形記》（北京：三聯書店，2019），頁 1-3。

⑫ 〈中共中央國務院出台 2007 年中央「一號文件」(全文)〉（2007 年 1 月 30 日），中國日報中文網，www.chinadaily.com.cn/hqkx/2007-01/30/content_796651.htm。

⑬⑭ 盧成仁：〈生態農業與新生產主義鄉村的型構——江西垣村的田野調查〉，《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2 期，頁 15-31。

⑮ Jakob A. Klein, "Everyday Approaches to Food Safety in Kunming",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14 (June 2013): 376-93.

⑯ 二十世紀 70 年代以來，基於對主流發展範式所帶來的各種社會、經濟和生態後果的反思，世界範圍內興起了使發展更具韌性、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的探索。這些探索嘗試重構「生產—消費」體系和地方治理機制，以不同的社會關係和生態實踐來創造一種「替代性經濟」，其中「巢狀市場」(nested markets)試圖從關係

和互動的角度切入，重構小農與市場的多樣化聯結，其主流方式是在農村生產者和城市消費者之間形成直接對接的、實名的、有相對固定的邊界以及具有一定認同和信任的新型市場形式。參見賀聰志、葉敬忠：〈小農戶生產的現代性消費遭遇——基於「巢狀市場小農扶貧試驗」的觀察與思考〉，《開放時代》，2020年第6期，頁45-60。另可參見陳衛平：《社區支持農業：理論與實踐》（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4）；帥滿：《尋找安全食品：一項信任演化的社會學考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⑭ Pál Nyíri, "From Starbucks to Carrefour: Consumer Boycotts, Nationalism and Tast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ORTAL: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6, no. 2 (2009): 1-25.

⑮ Steffanie Scott et al., "Contradictions in State-and Civil Society-driven Developments in China's Ecological Agriculture Sector", *Food Policy*, vol. 45 (April 2014): 158-66.

⑯ 潘家恩、杜潔：〈「現代夢」的別樣回聲：鄉村建設的資源與矛盾〉，《開放時代》，2011年第3期，頁69-83。

⑰ 參見Wen Tiejun et 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digenous Culture,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Monthly Review* 63, no. 9 (2012): 29；周立：〈序二：鄉村建設中的主體性與主體間性〉，載邱建生：《鄉建手記：一個鄉建工作者的實踐與思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22），頁5-17；潘家恩、杜潔：〈「現代夢」的別樣回聲〉，頁69-83。

⑱ 參見Alexander Day and Matthew A. Hale, "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39, no. 4 (2007): 3-9；Alexander F. Day, *The Peasant in Postsocialist China: History, Politics, and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⑲⑳ Zhenzhong Si and Steffanie Scott, "Rur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amid the Food Safety Crisis Strategi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China", in *Organic Food and Farming in China*, 180; 181.

㉑ 〈立德樹人好老師 | 何慧麗：鄉村建設的行動者，溫度教學的探索人〉（2019年9月11日），中國農業大學新聞網，<https://news.cau.edu.cn/zhxwnew/634424.htm>。

㉒ 參見舒聖祥：〈「教授賣大米」背後的信任危機〉（2006年1月6日），《中國青年報》網，http://zqb.cyol.com/content/2006-01/06/content_1228482.htm。

㉓ 2008年中國奶製品污染事件是中國的一起食品安全事故。事故起因是很多人食用三鹿集團生產的奶粉的嬰兒被發現患有腎結石，隨後在奶粉中發現化工原料三聚氰胺。

㉔㉕㉖㉗㉘㉙ 黃志友：〈中國鄉建網絡與社會生態農業CSA發展回顧〉（內部資料，2018）。

㉚㉛ 劉志艱：〈一群新農人的新農場〉（2022年12月19日），澎湃新聞網，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225002。

㉜ 「消費者教育」指引導消費者注重農產品健康和安全的品質，而非一味注重農產品的外觀和品相；另外，由於小毛驢農園為市民開放「包地」份額，使其可親身參與農作物種植過程，市民也將其作為「農事」教育的一部分。

㉝ 2015年11月19至21日，溫鐵軍發表了〈在「第六屆國際社區支持農業大會/第七屆中國社會農業CSA大會」開幕式上的發言〉，此時CSA還未被正式譯為「社會生態農業」，但是在該次大會上成立了「中國社會生態農業CSA聯盟」，並在2016年第八屆中國社會生態農業大會上正式註冊。自此，CSA被正式翻譯為「社會生態農業」。參見黃志友：〈中國鄉建網絡與社會生態農業CSA發展回顧〉；〈溫鐵軍：鄉村社會與鄉村文化的復興〉（2015年11月27日），鄉村發現網，www.zgxcfx.com/sannonglunjian/77616.html；〈第七屆CSA大會〉，社會生態農業CSA聯盟網，

<http://csanetwork.cn/index.php/cms/show-35.html>；〈第八屆 CSA 大會〉，社會生態農業 CSA 聯盟網，<http://csanetwork.cn/index.php/cms/show-36.html>。

⑩ 〈溫鐵軍：CSA 絕對不是烏托邦〉（2017年7月17日），第一財經網，www.yicai.com/news/3239837.html。

⑪ 2021年8月31日，在北京「食通社」主辦的「食農分享會」上，「小柳樹農園」的農場主做了題為「怎樣種出美味又有顏值的蔬菜」的分享，期間做出如下判斷。參見 www.bilibili.com/video/BV1B3411B7uL。

⑫ 溫鐵軍：〈中文版序言：理解中國的小農〉，載金（F. H. King）著，程存旺、石嫣譯：《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頁1-4。

⑬ 潘家恩、杜潔：〈「現代夢」的別樣回聲〉，頁69-83。所謂「負外部性」，在溫鐵軍看來，主要是世界資本主義擴張過程中，在各地發生的原始積累過程。參見溫鐵軍：〈百年中國，一波四折〉，《讀書》，2001年第3期，頁3-11。

⑭ Gregory A. Barton, *The Global History of Organic Farm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84-85.

⑮ 伊懋可（Mark Elvin）著，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譯：《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

⑯ Yunxiang Yan, ed., *Chinese Families Upside Down: 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and Neo-familis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Leiden: Brill, 2021), 1-30.

⑰ 有趣的是，較早提出「精英俘獲」現象的，恰恰是溫鐵軍指導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目標、重點與政策研究」課題組在對農村合作社進行調研後的發現，原意指在新農村建設資源分配中，實際上已由大多數政府主導論為部門利益主導，它們追求的並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這導致精英農戶、專業合作社「截流」資源，而多數小農被「客體化」和邊緣化。後來這一提法被廣泛運用，描述鄉村精英在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等方面既有的突出優勢，強調精英憑藉自身多重優勢實現資源俘獲的過程。參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目標、重點與政策研究」課題組、溫鐵軍：〈部門和資本「下鄉」與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9年第7期，頁5-12。

⑱ 梁漱溟：〈我們的兩大難處——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研究院講演〉，載《鄉村建設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368-78。

⑲ 費孝通著，趙旭東、秦志傑譯：《中國士紳》（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101-10。

⑳ Tani Barlow, "Zhi shi fen zi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Power",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16, no. 3 (1991): 209-32.

㉑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褚建芳譯：〈地方世界：現代中國的鄉土詩學與政治〉，載王銘銘主編：《中國人類學評論》，第二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7），頁21-50。

㉒ 余昕：〈「自然」的生成——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業生產中的地方和世界知識〉，《開放時代》，2024年第1期，頁90-106。

㉓ Hairong Yan, Ku Hok Bun, and Xu Siyuan, "Rural Revitalization, Scholars,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Collective Future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8, no. 4 (2021): 853-74.

㉔ Alexander F. Day, "The End of the Peasant?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Boundary* 35, no. 2 (2008): 49-73.

㉕ Matthew A. Hale, "Reconstructing the Rural: Peasant Organizations in a Chinese Movement for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13).